

#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怎样传入中国

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  
就像枯黄树叶遇见凛冽秋风

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在全世界第一次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掀开了阶级斗争从国家内部扩展到世界范围的大幕。十月革命对中国无产阶级意识形成影响巨大:一是为中国劳动阶级提供了世界主义意识,使其对中国劳工运动的认识开始超越国家范围,将自身视为全世界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二是通过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宣传和组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意识应运而生。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三天,上海《民国日报》就以《突如其来俄国大政变》对其加以介绍。之后,《时事》《申报》《晨钟报》《太平洋》《劳动》《东方杂志》等纷纷对十月革命过程、劳工政权、反地主反资本主义基本方针及和平友好外交政策等进行报道。

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力启发了李大钊。他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阵地上奋笔疾书,陆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演说,并且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

李大钊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文明之曙光。他强调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宣告布尔什维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李大钊认为,“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是“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个地飞落在地”。

李大钊的文章和论述,在当时的有志青

中国工人的文化程度虽然落后,虽然百分之九十是不识字不能直接看报,然而街谈巷议,工人们是听着的。特别是俄国十月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更使得中国工人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励。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职工运动开始它的黎明期。

年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进而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1918年至1919年,世界范围的罢工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引起国人关注。一时间,十月革命及其掀起的世界革命浪潮,进一步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议论的焦点。罗家伦号召架起帆柴做一个世界的“弄潮儿”,颇具代表性。对此,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视为“过激主义”“赤祸”。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从中看到强力政党对革命的重大作用,这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打下基础。

## 华工组织赤卫队 直接参加十月武装起义

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

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具体揭示了十月革命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巨大激励:世界革命潮流的消息当时在中国报纸上真是“日不绝书”的,中国工人的文化程度虽然落后,虽然百分之九十是不识字不能直接看报,然而街谈巷议,工人们是听着的。中国工人经济生活那样极人世间的痛苦,迎接世界革命潮流,不用说是很自然的;特别是俄国十月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更使得中国工人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励。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职工运动开始它的黎明期了。

早期中国海员从逃亡的白俄分子口中了解到十月革命的消息,尽管当时对“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等语词一无所知,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对于工人阶级打倒资本

家十分憧憬。十月革命后,苏兆征、林伟民等早期海员运动领袖相继随船抵达苏俄远东地区,在国际海员俱乐部等地方活动,阅读到了介绍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书刊。早期海员运动领袖朱宝庭在听说列宁领导俄国革命将大官关进监狱、穷人搬进洋楼并建立工农劳动政府后,称赞“他干得真好,我们也得这样来一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旅俄华工对十月革命多有亲身感受。从1916年5月开始,北洋政府向英、法、美、俄等协约国派遣劳工。其中,赴俄华工主要从事西部战场挖战壕、装卸军用物资等事务,还承担铁路、港口工程以及西伯利亚开发、煤矿开采等繁重危险的劳作。劳工中的大多数都参加了工会组织,“唐山华工张森等还亲自听到过列宁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讲演”。

十月革命中,大批旅俄华工参加了红军。苏联红军第三军二十九师后备团、乌拉尔中国团、莫斯科的中国团等全体成员都是华工。在莫斯科、彼得堡,华工组织的赤卫队,直接参加了夺取冬宫的战斗和莫斯科的十月武装起义。这批华工回国后,进一步在工友间传播阶级斗争意识和罢工思想。

## 上海的《共产党》杂志 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十月革命前,中国人已对马克思主义有过零星的介绍。比如,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曾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状况及其主要历史功绩,还

# 青年茅盾显峥嵘

现代文学巨匠茅盾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他既担任党中央直属的联络员,负责党中央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联络,又为党的发展建设筹措资金、为党的刊物义务写稿、为党创办的平民女校义务讲课,还给陈独秀联系工作、给上海地方党组织租用办公场所、帮特工队保管武器……这些事迹,并非所有人都知晓。

## 给“钟英”当联络员

中共“一大”后,鉴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迅速发展,党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沟通成了新问题,迫切需要忠诚可靠的共产党员负责党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络工作。党中央看中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沈雁冰,让他担任直属中央的联络员,将他暂时编入中央工作人员的一个支部。各地党组织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材料,要先寄给沈雁冰,在信封上注明“商务印书馆沈雁冰收”,内里的信封上再标“转钟英小姐收”。当时茅盾正编辑《小说月报》,每天要收到很多来信,这些“转钟英小姐收”的信夹杂其中,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茅盾会将“转钟英小姐”的信整理好,定期送到上海的党中央机关。

全国各地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工作的人,也要先到商务印书馆找沈雁冰,对过暗号后在旅社等待,由茅盾向党中央汇报,再安排见面。为此,茅盾每天都去商务印书馆办公,“为的是怕外地有人来找我时两不相值”。这份秘密联络工作他一直做到1925年年底,其间没有出过半点差错。

## 想方设法筹措活动经费

中共“一大”前后,我们党的活动经费主要依靠一些知识分子的个人捐赠,数额十分有限,经常是人不敷出,捉襟见肘。为此,李汉俊、陈望道、茅盾等年轻的共产党人一直想方设法为党的发展建设筹措资金。因为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可以支付稿费,所以上海共产党小组成员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人同茅盾商量,决定通过写稿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然后将作品卖给商务印书馆,或在商务印书馆的杂志上刊载,以此来筹措党的活动经费。陈望道曾回忆:“李汉俊、沈雁冰、李达和我都搞翻译,一夜之间可译万把字。稿子译出后交给商务印书馆,沈雁冰那时在商务工作。一千字四五元,大家动手,可以搞到不少钱。”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统计出这些人筹措了多少活动经费,但按陈望道的说法,千字四五元的稿费标准,已经比商务印书馆通常给付的稿费标准高很多,这中间,茅盾的贡献不言而喻。据商务印书馆的史料记载,当年有人向张元济推荐名人译稿,张元济开出的稿费是千字二元;商务印书馆的学徒,每个月的工资也就二三元。茅盾在回忆录中也提到过,杂志上所用翻译作品的稿费,一般是“千字一元至二元”。不过这样的事,在当时都是秘密进行的。

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不仅通过写稿和翻译文学作品为党筹措活动经费,还无私、无偿地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茅盾在回忆录中就专门讲过给《新青年》无偿写稿的事:“当时我们给《新青年》写稿都不取报酬。”不取报酬并不是因为茅盾不缺钱,而是因为党的活动经费实在是太紧张了,给《新青年》无偿写稿,就是为了减轻党的压力。其实,茅盾不光给《新青年》写稿不取报酬,给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杂志写稿也不取报酬。后来,中国共产党创办平民女校,着力培养党的妇女干部,茅盾和一

些共产党人也义务去平民女校讲课。

中共“一大”召开后,大量党务工作需要总书记陈独秀主持和处理,因为当时陈独秀在广州,所以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坚决主张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全党工作。陈独秀回到上海后,生活出现困难,正好商务印书馆有意聘请陈独秀为馆外名誉编辑,借名人效应提高社会影响力。商务印书馆知道茅盾和陈独秀相识,就请茅盾与陈独秀联系,征求他的意见;当然,商务印书馆并不知道茅盾是陈独秀的同志,此事和陈独秀当时的处境与需求亦不谋而合。茅盾反复联系、沟通,促成此事,既解决了陈独秀的生活问题,又能让陈独秀专心致志地从事党务工作。同年9月陈独秀回上海。

陈独秀回上海后,商务当局要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陈表示月薪不必多(当时商务招致名流为馆外名誉编辑,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因为他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的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月薪三百元,编辑事务不像其他名誉编辑那样要给商务审阅稿件,而只要每年写一本小册子,题目由陈自己决定。

## 为党的事业“买单”

除了借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身份,为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筹措活动经费,茅盾还自掏腰包为党的事业“买单”。徐梅坤曾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下文简称“区委”)的书记,茅盾、俞秀松等人是他的同事。据徐梅坤回忆,“‘区委’最初只有十几名党员,都集中在上海。我现在能记得的有陈独秀、李达、沈雁冰、张国焘、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向警予、李启汉、杨明斋、李震瀛、邵力子、杨贤江(商务印书馆编辑,于1922年5月、6月间入党,可能由我介绍入党的)等人,其中一些人时来时往,流动性很大,有些人不参加会议,所以开会时人员从未到齐过”。徐梅坤还披露了当年茅盾自掏腰包为“区委”租办公室的事:“‘区委’最早的办公机关设在成都路中段的一个弄堂里,租了一间小亭子间,每月由沈雁冰拿出一百元房租赁费。沈雁冰当时的收入多,每月薪水五百元,他用自己省下的薪水来资助党的活动。”对此,茅盾在回忆录中并未提及。

中共“三大”后,针对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工贼”以及党内出现的叛徒、奸细等,我们党决定成立特别支部,由徐梅坤担任特别支部书记。徐梅坤提到:“在各处大小工潮中,打击工贼的问题便提到日程上来了。为此,我决定组织特别支部,由我任特支书记,专门对付工贼走狗和共产党内的叛徒、奸细。接受任务后,我到许多工厂去物色可靠的工人,组织了特工组,由我担任组长,组员有李剑如、张阿四、肖阿四等四五人,这是我党用武器对付敌人的开始。当时,我们有五把锋利的英制小斧头,后来我从意大利军火船上买了四支意图造手枪。用手枪行动有危险,容易暴露目标,就将四支枪暂时存放在沈雁冰家里。这个秘密的反奸组织——特工队,就是以后的‘打狗队’。”这是我们党早期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一个小片段,徐梅坤将武器存放在茅盾家中,是需要茅盾一家承受极大的风险的。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茅盾为党的发展壮大做了许多秘密工作,贡献巨大。虽然时间已经过去近百年,但老一辈革命家为党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感佩不已。 □钟桂松

人物春秋

中国人讲到饮食养生,常有个说法:“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中国传统饮食以蔬菜瓜果等为主,而植物大都在一年四季中完成一个生命轮回,每个阶段都有营养最为集聚的部位。夏日食瓜,消暑降温,西瓜自古就是消暑解渴的食品之一。你知道这一夏日甜味源自何处吗?

## 五代晋人留下食瓜记录

西瓜原产非洲,现在那里还有野生的西瓜品种,后来才向北传到欧亚,来到中国。早期的西瓜引进栽培者正是受到其口味的诱惑。

西瓜在中国开始种植,最早的记录保存在五代时晋人胡峤所著《陷北记》中。胡峤本是后晋同州郃阳(今陕西合阳)县令,北方的契丹征晋时,胡峤在契丹一个部首领萧翰手下掌执文书,后随其北归。回中原后,他把流居契丹七年的经历见闻记录下来,就有了这本《陷北记》,其间特别记录了契丹都城上京附近的西瓜种植。

上京约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古城今存。胡峤说,这里的西瓜,是契丹打败了西边的回纥得到的种子。契丹人种西瓜,是“以牛粪覆棚而种”。覆棚,相当于今天的温室大棚。现在看来,赤峰一带虽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合瓜果贮藏糖分,但最大的问题是无霜期短,整体温度低,所以才用了暖棚种瓜之法。由此可见,当时的契丹人已掌握了西瓜种植技术,所结的西瓜个头不小,“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胡峤是陕西人,此前未见过西瓜,在他眼里,这是属于奇珍异果的。

## 南宋年间内地种植“开局”

胡峤是从契丹国“逃归”,所以,他尝到了好吃的大西瓜,似乎并未想着带种子回中原。此后一百多年,关于西瓜种植未曾留下文字线索。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中国人可谓地球上数一数二的“种植民族”,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皆对农桑格外关注。早期有关西瓜的文字记录少,大概率是因为西瓜确实还未在内地普遍种植。大约到了南宋年间,西瓜在内地的种植才“开局”。自然物种的引进迁移,常常伴随着民族、文化的冲突和进退。于是,西瓜秧蔓延开来,相关记载渐渐多了起来。

公元1170年农历八月,范成大作为南宋使节向北渡淮河进入金地,后经北宋故都东京(开封),继续向北渡过黄河,于十月到达金都燕京(今北京西南),其间共作诗72首,收于《石湖居士诗集》。唐宋文人写诗,虽有字斟句酌的苦吟派,但更多时候如同我们写日记,或者发朋友圈,所见所感随时而作,颇有些纪实性的特点,所以后人常以诗证史。

这组诗中有一首《西瓜园》就记录了他一路所见西瓜种植的情况。诗中说:“碧蔓凌霄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形模漫落淡如水,未可蒲萄苜蓿夸。”范成大进入金地已入秋,他看到绿色蔓蔓的西瓜蒙着白霜,卧于沙地之上,是当地司空见惯的鲜瓜果。不过,范成大似乎对西瓜没有太多好感,认为西瓜“形模漫落淡如水”,意思是形貌空廓不实,内瓤寡淡如水,虽说同是舶来品,性价比却远不如葡



西瓜在中国开始种植,最早的记录保存在五代时晋人胡峤所著《陷北记》中。 新华社发

# 夏日甜味越千年

葡萄苜蓿。

范成大不觉西瓜好,也许是他没吃到好吃的西瓜。中原地区昼夜温差小,西瓜口感普遍不如北地种植的甘美。不过,有时心情也决定口味,在诗题下,范成大自注云:“味淡而多液,本燕北种,今河南皆种之。”他感慨本是“燕北种”的西瓜,如今北宋故地“河南”皆种之,也隐隐有些亡国之恨。

## 古人发现西瓜之妙用

不过,同样出使金国,比范成大更早年的“外交官”洪皓似乎就没那么多感慨,反倒积极引种西瓜。

洪皓是江西人,他在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出使金国,绍兴十三年(1143年)返回临安,在金地生活的时不短。其间随笔记录了许多金国杂事,离开时曾担心被金人搜括,遂一把火烧了,后又凭记忆追述一二,名曰《松漠纪闻》。书中,他明确交代了自己从金引种西瓜的情况。

洪皓引进的大约是一种长圆形的西瓜,“形如扁蒲而圆,色极青翠”。扁蒲,是一种蔓生的瓠瓜,又称瓠子。西瓜形如扁蒲,但更大、更浑圆。文中说到的“脆”是小瓜,西瓜未成熟时的小瓜也可食用,比如与茄子、辣椒一同切条切丝炒食,略焖几分钟,瓜条变软,渗出的汁水让茄子吸了去,整道菜汤汁浓郁,配米饭,或拌面条,都极好。不过,洪皓这里说小瓜口感“甘脆”,汁水清凉,大约是当黄瓜一样生食了。此外,文中所说的“禁圃”指的是杭州皇家御园,“乡圃”指的是农村的果菜园。这些地方“皆有”,可见引种后西瓜种植范围已经很广了。

洪皓是江西饶州鄱阳人,他回到临安

## 语林指瑕

万卷出版公司出版的《随园诗话》卷五,有则诗话言某少年作怀古诗,动不动就百韵,作者袁枚劝诫之,以汉高祖将兵作战,言“用事如用兵,愈多愈难,以汉高之雄略,而韩信只许其能用十万。可见部勒驱使,谈何容易。”文下配有高祖入关百姓争持牛羊酒食以献之图。图下说明文字,冠以“入关约法”。其文曰:高祖进入峽关,与当地父老豪杰约法三章,大错而特错。此图真矣,然《帝鉴图说》并未说此关就是峽关。所以此文之“汉高祖进入峽关,与当地父老豪杰约法三章”,大错而特错。

史载,汉高祖(其时尚称沛公)所进入之“关”,指“关中”,即他过武关后而进入之关中,地在今陕西中部。“关中”之说有二,一曰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四关之中也。一曰东自函谷,西至陕关,二关之间谓之关中。秦之怀王、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与秦兵主力决战;令沛公刘邦西略地入关,与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沛公乘虚西向,秦二世三年八月(前207)刘邦攻破武关,入秦,秦相赵高恐,杀二世,立子婴为秦王,子婴诛赵高,遣兵拒守峽关(地在今蓝田县东南,因近峽山得名)沛公依张良计,引兵绕峽关,踰骊山,与秦军战于蓝田(县名,今属西安市)南,大破之,又次于蓝田北,大破之,乘胜,遂破之。汉元年(前206)冬十月,沛公兵先逐诸侯至霸上(地名,在今西安市东郊),秦王子婴降,沛公逐入秦都咸阳,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桀(杰)曰:“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悉除秦苛法。”(据《史记·高祖本纪》)

由此可见,沛公入秦,曾过两关,即武关和峽关,而非非峽山之峽关。峽关,地在今河南洛宁县北,位于三门峡市陕州区东,距霸上六百里开外,与沛公入关八竿子都打不着,孰知竟被混而淆之一至于此。 □杨乾坤

# 「约法三章」是在峽关吗?

钩沉